

乌兰察布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乌兰察布盟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二月

乌兰察布文史资料 第三辑

编 辑：乌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封面印刷：内 蒙 古 蒙 文 印 刷 厂
内文印刷：内蒙古察哈尔右翼中旗印刷厂

目 录

回 忆 录	大青山抗日战争琐忆	郝秀山 (8)
	绥中专员程必达在大青山 三岔口突围战	成枫涛 (84)
	激战骆驼山	蔡子平口述 乔澍声 王英整理 (154)
	大南山上战旗红	王树珍口述 李忠 赵玉整理 (123)
	官庄子一带军民团结斗敌	李成锁口述 吕经辉整理 (100)
史 料	无声的战斗	史秀英口述 王四清整理 (192)
	百灵庙战役拾零	李耀坤 (95)
	日伪时期在察哈尔右翼中旗 发生的三起惨案纪实	白天星 (110)
	天主教集宁教区的附设 组织机构	赵 琛 (89)
	我所知道的舍必崖天主教 的几件事	樊守信 (105)

史	乌盟地区建国前汽车运输概况	胡巴杰尔 (141)
	丰镇蛋厂和打蛋生产概况	阎增浩 (150) 刘葆铭
	清水河县陶瓷史话	孙 茂 (203)
	原达尔罕旗东苏木社会情况	马超群 唐宗林 (34) 邓子琴 纳古单夫
	原达尔罕旗旗制	纳古单夫 (171)
料	盆地青乡地方性“克汀病”的发现和调查	张黄庭 (195)
人 物 志	内蒙革命先驱——纪松龄	朱日明 白福山 (1)
	“同盟会”会员王虎臣小传	丁德奎 (118)
	我的初期革命活动	杨国兴 口述 高 旺整理 (164)
地方 风物	草原旅游胜地——希日穆仁	李 藏 (207)

封面设计

哈斯朝鲁

封面题字

魏 泉 深

内蒙革命先驱——纪松龄

朱日明 白福山

纪松龄蒙名赛胜阿，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五年）出生在绥东的正黄旗（现乌盟前旗）三苏木小淖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在一九一六年成立的国民学校和一九二〇年成立的八旗第二高等学校读书期间我们是同乡同学。学生时代的纪松龄聪明好学，有组织能力，正义感很强。在那青年觉醒的年代，纪松龄很早就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学生时期就经常参加革命活动，到农村牧区宣传革命道理，组织革命活动。一九二五年，纪松龄做为成熟的革命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内蒙古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

一九二五年十月。林西军官学校成立，纪松龄接受党的指示（北方局、领导人是李大钊）进入该校，并担任校长职务。他请了不少苏联人担任教职人员，宣传和研究苏联革命，为内蒙古革命运动培养出一大批骨干力量。

一九二七年春，轰轰烈烈的北伐革命震撼了全国。这场革命也波及到了内蒙古。李裕智、纪松龄、奎璧等同志团结左派和爱国者组织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军骑兵团。纪松龄任一营营长，奎璧任指导员。由于这支队伍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并且是中央北方局领导下的，所以对内蒙古早期的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例如，纪松龄和巴儒斋、孟让、胡景祥、奎璧积极支持了伊盟锡尼喇嘛的“独贵龙”运动。此外，他们还和陕北土匪、军阀作战，打了不少的胜仗，直接地支援了陕北的革命。这些对于以

后的革命运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九二七年四月份以后，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李裕智同志就是在这时期牺牲的。纪松龄和奎壁也受到右派反动分子白云梯的追杀。在革命转入低潮的情况下，纪松龄和奎壁被迫离开骑兵团转入地下斗争。严酷的现实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员，一些胆小鬼投降变节了，更多的人脱党了。而纪松龄并没有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失去革命的信心，他以更坚定的信念从事革命事业。他秘密联系绥东的地下党员与进步青年集会于马连滩富贤德家中（纪松龄的妹夫），研究、讨论当时的形势和今后的工作。当时组织上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做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决定让纪松龄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一九二九年，纪松龄、吉雅泰、毕力格巴图尔、巴儒斋、孟计、胡景祥、纪明德等十多人，秘密地分批从马连滩富贤德家向苏联（经外蒙）出发。临走时，富贤德给了他们每个人都带了不少的钱，并约定，学习完了还到他家集合。

一九三三年，纪松龄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由于工作需要提前回国，投入了地下革命活动。跟他经常接头的有吉雅泰和毕力格巴图尔等。不久，纪松龄接受中共中央的指令打入正黄旗绰号叫“长胡子”（真名叫达木林色楞）的地方武装部队。其主要目的，一方面为了争取蒙古上层人物，扩大革命影响；另一方面是为了吸收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建立革命的武装，设法把这支部队拉向革命方面（后来朱日明拉出这支队伍的一个排参加了抗日活动）。由于纪松龄出色的军事才干和在士兵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深得达木林色楞的信任，由一名副官很快提升为师参谋长。后来由于环境恶劣，他被迫离开了这支队伍。但他的影响为我们后来率领部队参加抗日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达木林色楞的长子就是在纪松龄的影响下弃暗投明参加抗日队伍的，后来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纪松龄离开这个部队后继续活动在京绥铁路

沿线和绥东一带。

一九三六年百灵庙暴动失败后，革命力量受到损失。当时的爱国抗日部队蒙旗保安总队队长云继先被德王杀害。为了重新组织革命力量，以武力反对德王的投日活动，乌兰夫、纪松龄、白海峰等人重整了蒙旗保安总队。这个队伍共四百多人，分两个大队，六个中队，一个特队，一个政训处和一个军训处。当时乌兰夫（当时叫云时雨，乌兰夫是到延安后改的）和齐希古任政训处的科长，纪松龄任一大队大队长，朱实夫任二大队长，纪贞甫任政训处处长。这支部队的领导人中共党党员占绝大多数，留苏学生有乌兰夫、纪松龄、纪明德、白海峰等九人。所以这个队伍的革命左派力量相当雄厚。部队训练了不到半年，日军就与德王的伪蒙军占领了张家口。保安总队由纪松龄带队在四子王旗、达茂旗、固阳县等处巡逻。记得部队到百灵庙时还收编了傅作义的一个炮兵连。十月初，日军占领绥东并向呼市进攻。白海峰带领司令部人员退到包头，由纪松龄带领的队伍阻击敌人。他指挥队伍在大黑河岸进行了三天三夜激烈的战斗，直到其它队伍都撤走，他才带领我们最后退到包头。

呼市失守后，日本侵略军向包头进攻，把大炮架在蹬口车站，向包头轰击。另外，飞机也不断向包头市内轰炸、扫射。纪松龄在包头找到了早先退到包头的白海峰和参谋长常荫森，研究部队去向。当时，包头已无正规军，仅有的马占山东北挺进军也支持不住，开始后撤，乌兰夫、纪松龄等同志决定保存力量，撤到伊盟，以图再战。由于人多拥挤，决定分两处过河。由于白天日机轰炸，部队在晚上才开始过河。纪松龄带后勤和一大队由二里半渡河。司令部和二大队由朱实夫带领从大树湾过河。纪松龄先让后勤过河，结果先过去的后勤人员被达旗僧盖连人带船扣留。纪松龄召开会议商量过河办法，决定先找司令部，如找不见就上大青山打游击。结果在第二天九点多钟才赶上司令部。由于沿河都没有渡船，最后部队在昭君山渡口找到三支破船，渡了一夜才全

部过了河。过河后，纪松龄告诉部队，伊盟的情况我们不了解，特别是现在后勤人员被扣留了，我们要特别警惕，以防部队再受损失。可是，参谋长常荫森在部队到达旗附近时命令部队吹号休息，这仿佛是告诉了人们我们过来了，休息后没走十里地，前后枪声就响了。纪松龄立即部署队伍站住阵脚向敌人还击，战斗异常激烈，纪松龄身先士卒，站在高处指挥战斗。战士们非常担心他的安全，几个连排长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对纪松龄高声喊道：“纪大队长赶快下来，那儿太危险！”然而纪松龄早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仍然站在高处继续指挥战斗，他的行动鼓舞了士气。在大炮的轰击和机枪的扫射下，敌人狼狈地撤走了。我们的大队长受了伤，三、四名战士中弹身亡，部队损失不小。这就是部队进入伊盟的第一个战役——展旦召战役。部队到东胜后开会总结这次战役。当时纪松龄非常气恼，他当众质问常参谋长为什么要吹号休息，并用枪逼着常参谋长讲出意图何在！常参谋长吞吞吐吐讲不清，被纪松龄训斥的无处躲藏。白海峰怕丢了常参谋长的面子，惹翻了国民党（常是国民党派进来的）就站出来调解。为了给常参谋长下台还批评了纪。至此部队前进就更不能走大路了，尽走些偏僻小路。部队最后到达哈拉寨住下后，白总队长带着常参谋长几个人到南京见蒋介石了，部队由乌兰夫和纪松龄管理。这期间，准格尔旗派了四个人来哗变队伍，纪得到报告后，亲自去活捉了这四个人，并把他们处以死刑。这件事的发生，使反动分子对纪松龄怀恨在心，就连国民党齐凤鸣的部队也想消灭他，但他们不敢冒动，只能是等待时机罢了。

领导一个五、六百人无给养经费的部队谈何容易！总队长白海峰出去求援，把这个乱摊子交给了乌兰夫和纪松龄等人。乌兰夫担任政治部主任，纪松龄暂时担任总队长。乌兰夫、纪松龄和朱实夫等人研究决定召集附近乡长开会，请他们暂时负担给养，待兵饷回来后归还他们。各乡长都答应了，因为在此混乱时期，只要有部队保护百姓，使之不受土匪的扰害，他们情愿负担部队的

给养。这样，部队的给养问题暂时解决了。在解决给养问题的同时，他们还在部队中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官兵的思想觉悟。部队的领导分头在士兵中宣传抗战保国，不当亡国奴的道理。并向士兵说明，困难是暂时的，胜利属于中国人民。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力量，乌兰夫、纪松龄、寒峰（李成林）朱实夫等共产党员商讨在独立旅内部发展党员。吸收历史清白，思想进步，立场坚定的青年军官参加共产党。在部队中，共产党员确实起了很大作用，部队的纪律严明，士气高涨，不怕苦，不怕累，熬过了一个个难关。这一阶段不仅部队受到了严格的整顿和训练，官兵团结一致，战斗力得到了加强，而且还掩护大批爱国青年通过伊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这支部队在一九三九年改编为新编步兵第三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吃国民党的饭给共产党办事。此时，正处于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并不甘心让共产党强大起来，因而多次掀起反共高潮。在内蒙古，国民党反动分子在新三师内部也有一部分，他们看到乌兰夫、纪松龄等人把新三师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部队感到非常害怕，便指使马占山先用软的拉拢纪松龄。当时马占山挺进军驻在准格尔旗纳林沙圪堵一带，他收编了东北反正部队姓屈的一个旅。他想让纪松龄带队伍归他，把新三师和反正部队合并为一。让纪松龄当旅长。纪松龄当时就拒绝了，马占山部的王照坤非常不满意，想用武力解决新三师。纪松龄和乌兰夫等同志经过研究决定暂离哈拉寨，把部队带到靠近八路军驻守的地区，以防敌人的攻击。会议结束后，部队立即出发，第二天就迎面碰上了马占山的部队。当时是上午九点多钟。当他们看到我们已有准备，就撤走了。这样部队就转移到了河曲县驻防。在河曲县，我们受到了八路军一二〇师贺龙部徐文烈科长的热情接待。他每晚给我们秘密开会，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乌兰夫、纪松龄分头在部队中搞宣传工作。这年正月十五灯节，日机每天侦察轰炸，徐科长回岢岚时，纪松龄曾与他约定好也靠近岢岚

并派云蔚骑兵连长开赴五寨县。在司令部开会讨论行动方向时，有一部分高级军官反对去岢岚。辩论中，乌兰夫、纪松龄坚决主张去岢岚，为了便于今后部队工作，乌兰夫、纪松龄只好改变原定行动路线，改向神木，府谷一带前进。

部队到了清水镇，听说敌人已占了河东的保德县。保德县与府谷县隔河相望，鸡犬声相闻。纪松龄下令守府谷县。官兵们都很踊跃，除勤杂人员留在清水镇外，其余的人马上出发了。部队走到半路碰到了八十六师一营，他们是从前线下来的。纪向他们询问前线情况，他们说敌人现在还没过河。他们是奉团部的命令撤下来的。纪松龄与他们商量驻守府谷，该营长说，没有命令，不能同往。纪松龄想向他们借些弹药，但被拒绝了。当时我们每支步枪只有廿粒子弹，轻机枪子弹就更少了，四门大炮也只有十发炮弹。这样同日本人作战是不能取胜的，所以只好忍痛撤回来了。部队返回清水河镇后，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雪，我们就踏着积雪向神木县进发了。

神木县是由八十六师的一个旅驻防的，旅长姓左，我们派人与他联系驻地，他不许我们进驻。于是纪松龄亲自上门责问他们：我们在前线抗日时你们按兵不动，现在你们又不让我们进驻此地，你们到底是抗日还是不抗日？这个旅长无言可答，只好答应东关一带由我们驻防。这样部队就在这里开始训练，休养生息，以利再战。

这年五月，白海峰回到部队，给部队发了半年的饷。这时部队改编为独立旅。由于人员较少，只编了两个团。纪松龄任一团团长，朱实夫任二团团长。每团编了两个营，每营两个连。司令部编了一个特务连，通讯连，运输连。另外，白海峰从武汉领来了一批东北人，参谋鲍金花，军需主任李文学，秘书陈云亭，参谋主任钱治国，副官主任律子正，还有一个姓孙的教育长，原副官主任吴月卿暂为副官长。朱日明为一团一营营长。部队为保持信誉，加强军民关系，信守了自己的诺言，很快将借用各地的粮款如数归还，热情招待了各镇镇长，群众都十分满意。纪松龄在军中的威信显然大

提高了。

一九三八年阴历四、五月间，延安召开四中全会，通知我们参加。由于纪松龄是我们部队重要的指挥者，所以派乌兰夫前去参加。同时向党中央汇报部队的工作。

这年七月，部队又回到伊盟，驻在赤劳图。一九三九年初，一团驻守伊盟的桃力民。不久，一团改为七团，纪松龄改任该团团长。纪松龄十分关心士兵的生活，例如，部队在桃力民时，他亲自买来牛羊肉分给士兵改善士兵的生活，他自己的生活也和士兵一样，从不搞特殊。但是他对士兵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例如，他不准官兵留长发，不准抽大烟。二营长赵俊臣抽大烟被团长知道了，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强制他忌烟还把他关了几关。汪副官坚持要留长发，说什么也不剃掉，团长很生气，强迫他剃了头。

一九四〇年以后，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一九四一年间，乌兰夫、克力更、寒峰等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志们先后都离开部队去了延安。纪松龄也带领一部分队伍回到河套地区，准备到绥东一带打游击，可是早已对他恨之入骨的国民党反动派认为放走他就等于放虎归山，后患无穷。然而又恐武力难以得逞。所以，就采取了卑鄙可耻的暗杀手段。他们买通了纪松龄的两个警卫员张三刚和戴进才。一九四二年初，旧历腊月二十九，张、戴将纪松龄枪杀于陕坝。国民党反动派为杀人灭口，在张、戴投靠国民党吴清云部时，把他们枪毙了。

蒙古人民的优秀儿子——纪松龄为了革命的事业牺牲了。他的牺牲对内蒙古人民的革命事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他的光荣事业永远为人们所赞颂！

1984、11

大青山抗日战争琐忆

郝秀山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五日

一 千训班期间同福岗留副官

一九三九年夏天，日本鬼子开始对绥西大青山区进行所谓扫荡，主要目标是进攻八路军。武归县委书记杨健林同志决定，我八区动委会的干部要疏散到群众中去，特别是地方干部可以回到家乡一带做群众工作，以减少动委会机关和游击队的目标。我和潘三娃等同志回到家乡一带活动了一段时间，待日寇进攻大青山区结束后，两人才回到灯楼树村找到杨健林同志。一见面，老杨同志就说：“咳，你两人来的正好，我正要派人去找，组织上决定你们俩和曹文玉、邢玉显四人去万家沟区党委干部训练班学习。好事啊！你们明天就去吧。”我们四个人很高兴。杨健林同志给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潘三娃同志带上，四个年轻人从灯楼树村出发，沿着大青山的蜿蜒小道，谈笑风生的朝万家沟方向去了。路上正碰上李井泉司令员带的一些干部到大沟去，我们跟上一一起进了大沟。李司令员的队伍头带大草帽，有的人穿着草鞋，走的特别快，真是雄赳赳气昂昂。

一九三九年的七八两月，我在绥远省区党委（有的说工委）主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地址在万家沟的大沟、杨树湾。训练班班主任是任克定同志，我们有十几个同学。夏秋季节气候很好，

我们也没铺没盖，住着老乡的暖炕。

不少领导同志都给我们讲课。任克定同志给我们讲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抗日的重要作用，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路线、民族政策，以及坚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艰巨性等。还有薛世英（此人后来叛变）、李部长也分别给我们讲过课。我们还听了白如冰同志的形势报告。那个报告会很大，有几百干部和八路军，坐在河槽上好大一片人。白主任讲了国内外的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还介绍国民党傅作义部队的代表康保安先生讲了话。那时候是国共合作，搞统一战线，国民党自卫军的司令部和我们的八路军领导机关都驻在大沟一带。杨植霖同志也给我们讲过课。我们除了听课、组织讨论外，也学习一些油印的小册子和书刊。大家学习都很努力，觉的新鲜、开窍。就在那时候，我又认识了于占彪同志，人们称他于部长。

由于住老乡的房子，人多房少，我们都分散居住。我和区党委司令部的一位日本人叫福岗留的住在一屋。他是我们俘虏过来的，当了我们的副官，管理机关的事务工作。这个人会说些中国话，他经过共产党的教育，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错误的，所以，他赞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并自愿参加了反侵略斗争。他工作认真负责、积极肯干。炊事人员每天做饭时，他还要把油、盐、小米亲自过分量，多一点也不行。增加人得向他报告才给增加粮食，否则不行。晚上点灯，他把一支洋蜡切成两截或三截，按需要分发给不同的房间，首长们发给一支或半支，一般同志每屋只给三分之一，点完了之。我和他住在一个屋，他到时（他有手表）就让我睡觉并熄灯，大约是晚上九点钟。有时，我想多看些书刊，向他再三要求延长点时间，他坚决不肯答应，并对我说：“制度是我定的，我不带头遵守，怎么再去管别人？你早睡早起补上时间不就行了！”有时候，我很不满意，甚至说他过分机械。福岗留同志却解释说：“为了打击日本侵略军就得有长期打算，处处节约，要不怎么能坚持抗战！”我问

他：“你是日本人，你真心同我们抗日吗？”他不大高兴地说：“你的不信任我，你的长官大大的信任我。我热爱我的祖国，但是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这也是日本人民的共同愿望。”我解释说：“不是不信任你，是说你有些机械。”福岗留副官接着说：“上级领导信任我，给了我权利，我就得认真地去办事，这是我的职责。”“好，副官同志，我向你学习。”他说：“谢谢，谢谢！”。

有一次两人闲聊中我问他：“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侵略我们中国？”福岗留说：“我们长官说日本财富的没有，中国财富大大的有，想占用一块地方。”我气愤的说：“这是强盗的说法”。福岗留表示赞同，他说：“所以，我的反对，我同你们八路的站在一起。”“我们日本人也有反战同盟组织，你看这是刊印的宣传文件。”“那么我们是真朋友了！”我高兴地对他说。

有一天晚上，福岗留副官对我说：“明天机关的开路，你的知道？”我回答：“知道了，”并问他走不走？他说：“我的不走，我留下收粮食、物资，并负责保管好，过些时候机关还要回来住。”第二天早晨我和他告别时，福岗留同志还对我说：“你的再回来，祝愿你平安！”我们训练班学员随同白如冰、杨植霖等领导同志由大沟出发，向一前响转移了。

经过小火烧窑爬上马黄龙坝。这座山上有一条蜿蜒小道，像长蛇一样，弯弯曲曲十多里长（一前响是说走半天）。白如冰同志拐着腿很吃力的同大家一起爬山；白凌云同志腰间皮带上挂着小左轮手枪和其他同志一样，也是徒步爬山。他们都有骑马、骡，但并没有骑，而是让警卫员牵着跟在他们后边走，整走了半天，下午到了西沟村杨广德老乡家住下。这村里就这么一大户有钱人家，我们训练班学员七、八个人住在此房一条大炕上。

我们又开始了紧张的学习，每天主要是听课，组织讨论。八月下旬结业时，还进行了作文考试，我的作文试卷是杨植霖同志亲自审阅的，并在作文上批了“成绩尚好”四个字。学习结束

后，又让我们四人回武归县委找杨健林同志安排工作。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福岗留这位朋友。因为那时候，交通不便，消息不灵。一九四二年我才知道福岗留同志得“伤寒病”去世了。现在他安葬在土默特左旗“烈士陵园”醒目的地方。

两个月的时间学到了不少知识。进一步理解了共产党领导抗日的伟大意义，增强了抗日一定能够胜利的信心。同时，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初步认识到如何在群众中起到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那时候党员不公开，但任克定同志多次找我单人教练（个别谈话），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任务的教育，所以，收获是很大的。当时我知道潘三娃、邢玉显两人是党员，但在训练班时没有发生关系。

那时山里住的机关部队人员较多，粮食困难。我们训练班每天两顿小米饭，没有菜，有时炒一点白菜，基本上是小米干饭。我看到杨植霖同志也同我们学员吃的差不多，他们有时吃一顿馒头，生活很艰苦。但大家情绪特别高，除了学习、看书外，唱歌呀，跳舞呀，特别乐观。大家学习很努力，不少同志常常坐在树林里看书。

保护机关的警卫部队，每天进行训练。早操、上课、瞄准、刺杀等抓得很紧，确实是一支守纪律、有本事、能战斗的正规部队，叫人看了高兴。在部队驻地，不仅屋里、院里干干净净，而且房前房后、街道都清扫的那么干净。住那么多人，听不见嘈杂声，看不到有人闲遛达，工作、学习、讲课、出操井然有序。

大沟李支队的司令部距离国民党自卫军第三路的指挥部很近，我们经常看到他们那些队伍穿得五花八门，倒挎上支枪遛遛达达。鄂友三是三路的参谋长，也经常带上两个护兵转来转去。我们学员常常议论说和这些土匪队伍驻在一块是有危险的。

有一次，我问福岗留同志：“你看南坡上（大沟村南坡）驻的自卫军怎么样？”他说：“他们的不行，他们大大的草包，一击就破”。我们两人边说边叽叽咯咯笑了一阵。福岗留最后

说：“国民党的军队要象八路军那样，你们的国家就不会有这么大的灾难。”

二 “农民”雨三做社会调查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月间，杨植霖同志（字雨三）为了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做社会调查，由大沟只身以农民身份到达武川八区义合乡（我的家乡）和王景堂同志家乡一带活动。他到我家住了几天，我便从前山回去陪同他。我母亲每天给他做些可口的饭，如我们吃莜面时给他蒸鸡蛋汤，有时也给他吃炒鸡蛋烙油饼。老乡们都说这个人非凡，一定是一个大念书人。有人问我他名谁姓啥，干什么事的，我都回答说他叫王雨三（雨三是他告知我的），是我的老师。他身穿兰粗布衣服，穿一双粗布鞋，头上扎一块白毛巾，完全是老百姓打扮，但细看又不象老百姓。其实，我们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不是老百姓，一是住到我家同我活动，二是他找些农民谈话，虽是本地口音，但言谈国家大事，所以乡亲们都称他王先生。

正是秋收季节，植霖同志一定要和我下地拔小麦。后山地区拔麦子是苦事，他的手恐怕一拔就会勒破的。我的母亲不让他去，他坚持要去。为了防止手起泡，我父亲让他用布裹好了手指，我们就一同下地了。我父亲拔四垄，我们两人各拔三垄。他一面劳动一面给我讲全国抗日战争的斗争形势和分析农村各阶层人士对抗日救国的态度。当时的政策是依靠贫雇农、争取地主老财支援八路军抗日救国，团结各方面的人士，广交朋友；同时还谈到做秘密工作应注意的问题等等。连续劳动了两天，找了不少人进行了社会调查，他的言谈吐语和实际行动对我都有很大启发。我们村里的乡亲们也说，这位王先生可不简单啊！他能劳动会讲话，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一定是一个大人物。杨植霖同志经常在外面席地而坐，和老乡们闲聊。他的脸晒黑了，手上长了茧。人

们也不以为他是外地来的陌生人，逐渐熟悉了，亲热了，见面也就话多了。

有一天，杨植霖同志正睡午觉，翻身时把腰里别的手枪掉在炕上，我母亲和我的二姪姪看见了，吓的不行，又不敢叫，又怕来人看见声张出去，两个老人急中生智，用我弟弟的尿裤子盖住了，尿臊气把苍蝇招来了，苍蝇把王先生咬醒了，他用手一摸枪没有了，抓起尿裤子就哈哈大笑：“你老们给盖的吧？”我母亲说：“怕别人来看见传出去不好，把娃娃的尿裤子盖上了。”大家边说边笑了一阵子。以后我们家乡人就把这件事传成了笑话，一说起来大家就笑一阵子。

过了几天，杨植霖同志去五家村一带找王景堂同志。然后从伪义合乡公所要了个乡警的袖章佩带上，有时以乡警的身份掩护活动（因为青达慕一带有伪军警活动）。我陪他在家乡活动了一段后就回山里去了，杨植霖同志与王景堂同志活动了一段后，也回到灯楼树村找杨健林同志取得联系，他们研究决定后山建立一些秘密工作点。杨健林同志肩上搭着钱褙子，手里拿着大烟袋也上后山黑沙兔一带活动。王景堂同志在五家村（义合乡一带），有时也到七区的黑兰杆杆一带活动。这时，赵晋唐同志也到了五家村以西的崔三壕一带做秘密工作。后来，在我的家乡也建立起地下党的组织，我的二弟弟参加了共产党，做了地下党支部副书记（这是我弟弟病故后，一九四一年高鸿光同志告知我的，同时告知我与三个党员取得联系）。

大约是三九年十月上旬，我在前山榆树沟村碰见了杨植霖同志。他穿着一件兰粗布棉袄，头上带着白毡帽子。他对我说：“我不久可能回万家沟去，你们也要深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展农会，要秘密地搞，多交些朋友。要有选择地、个别地发展党员，但必须是秘密的、单线进行，这项工作杨健林同志以后会给你安排的。”还嘱咐我们一面工作，一面不要忘了学习，不断提高自己。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些话